

薪火四代

梁从诫
编选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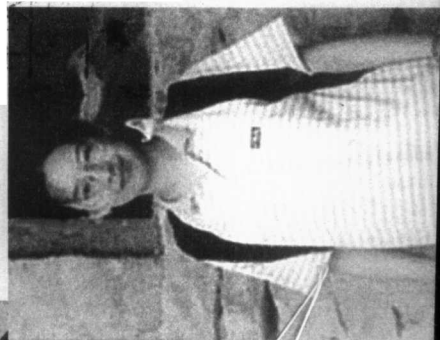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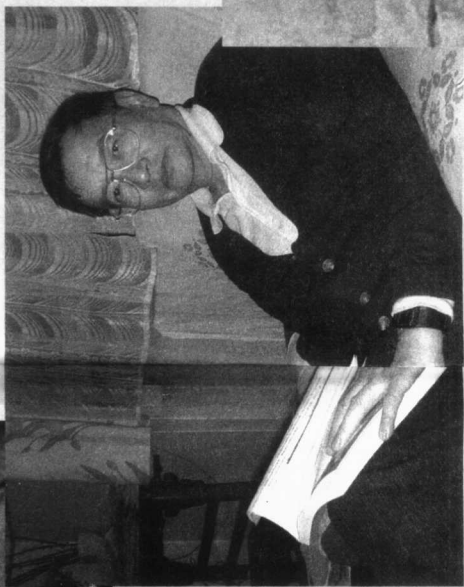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53
406

薪火四代

梁从诫 编选

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薪火四代 / 梁从诫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434-8

I. 薪… II. 梁…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481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4.375 插页 4 字数 568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套

每套定价: 37.00 元

中国犹待新民人(代序)

——百年回首看梁启超及其家族

张作锦

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渐渐“不重视”中国;等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开始“轻视”中国。中国不仅失去尊严,失去国际地位,且瓜分豆剖之祸迫在眉睫。此时不忍坐视国族沦灭的志士仁人,开始救亡图存的努力。

这些志士仁人为数不少,其中最热心、最积极,而又影响最深远者,依我之见,应首推孙中山和梁启超。孙氏认为时局缓不济急,要立即换一个新政府;梁氏认为国家若想长治久安,国民要先换新精神。尽管两人的救国步骤容或不同,但他们献身国家同胞之忠诚则并无二致,都是念兹在兹,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艰苦遍尝,真正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世人皆知梁启超名其书斋为“饮冰室”,自号“饮冰室主人”。“饮冰”一词,典出《庄子·人间世》篇:楚庄王的玄孙诸梁为楚大夫,奉命出使齐国,自觉责任重大,特来向孔子请益,他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早上接到诏命,傍晚就要喝冰水解热,其内心忧急焦躁可知。梁氏以“饮冰”自况,足征其对国事思虑与不安的程度,也象征他把救国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了。

梁启超毕生尽瘁国事,还有其他不少事证:

第一,追随康有为“公车上书”时只有二十三岁,撰《变法通议》倡导维新时只有二十四岁,可见年轻时就立定了救国的志向。

第二,他用“哀时客”、“爱国者”、“中国之新民”等笔名写时论文章,都足以明其心、言其志。

第三,后人为他编辑的《饮冰室合集》,共一百四十八卷,约一千四百万字。若从他二十四岁写《变法通议》算起,到五十六岁逝世,一共写了三十二年,每年要写四十三万字,就是“全年无休”,每周也要写一万字左右,且都是匡时济世的有力之作。如果不是对国家有情,对同胞有爱,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长期支撑他如此辛勤?

梁启超的文章,绝大部分发表在他自办的刊物上,从《万国公报》到《时务报》、《清议报》以迄《新民丛报》,其中又以发表于《新民丛报》者最多,也最关重要。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此时日本承“明治维新”之余绪,大量译介西方新学说,引进和阐扬西方新文化。读了这些书,与日本这些新人物来往,使梁启超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也得到很多的启发。他更了解日本为什么能强盛,也更知道中国为什么会积弱。

梁启超的忘年交黄遵宪(公度)曾在驻日使馆任职,对日本甚有认识,撰《日本国志》,书成多年始出版,梁启超为之作序,有云: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慙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其实,梁启超早就理解到,仅追求“船坚炮利”并不能救中国。在写《变法通议》,讲到“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时,他就引德国人的

话来做说明：

昔同治初年，德相俾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

总而言之，梁启超认识到，要强中国，先要强中国国民之精神。于是在一九〇二年，他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开始他“唤醒国魂、改造中国”的大工程、大事业。在创刊号首页，以广告刊出《本刊告白》，揭櫫《新民丛报》的宗旨：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也从创刊号开始，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这个笔名，开始连载《新民说》系列文章。何以要“新民”？梁启超在《叙论》中慨然指出：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中国人几千年来，企盼“圣君贤相”的政治，但梁启超指出，“国

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政息焉。”反之，“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虐刘一时，而其民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梁氏坚决认为，“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他说：

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不过梁氏亦恐国人误解中国固有的文化均为糠粕，要“全盘西化”，所以赶忙解释：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

既然“新民”始可以“新国”，那么，怎样“新民”呢？梁启超主张，首先要新“民德”。梁氏此处所指之“德”，不是“私德”，而是“公德”。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连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令梁氏遗憾的是，“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为了提高国民生活在“群”中必要的道德，梁启超撰《十种德性

相反相成义》长文,提出十种德性: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这些德性,在形式上好像相反,在精神上却是相成,为走向文明国家的国民所必备。他解释说:

知有合群之独立,则自由而不乱紊;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国之道亦在是。

梁氏并强调,在道德上不能独立,个人就不能独立,国家也就不能独立。他说:

今世之言独立者,或曰拒列强之干涉而独立,或曰脱满洲之羁轭而独立。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

《新民说》约十一万字,分二十节,内容包括《论公德》、《论私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毅力》、《论生利分利》……举凡现代国民所应有之修养、现代国家所应备之条件,梁启超都深刻地讨论到了。《新民说》还只是《新民丛报》刊出文章的一部分,梁氏还写了其他大量的论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议题。

梁氏本来学问渊博,国学根基深厚,到日本后,接触西学,思想境界更大为扩张,再加上他“笔锋常带感情”的特殊文体,使《新民丛报》一纸风行,从日本传入内地,各处大量翻印;且亦流传到美国、加拿大、澳洲、朝鲜和东南亚各地华人地区,对中国人新知识的灌输、新思想的启发,影响至为深远。论者有谓,中国新文化的启

蒙，不自“五四”，而自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中国当时仍在清朝统治之下，学校禁止学生读《新民丛报》，学生反抗，有为此酿成学潮者。当时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毛泽东这班人，都受到梁启超文章的感动。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个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所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陈独秀办《青年杂志》，不久就改为《新青年》，这个“新”字，与《新民丛报》、《新民说》，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早年仰慕梁启超，因梁启超字任公，毛乃为自己取名“子任”。他读《新民说》，每在文章旁边加上标点和评语。现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就藏有一张毛注上“读书心得”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影印本。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启超病逝，胡适挽以联曰：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此时的胡适，已非青年时期的胡适，不是对梁启超只有崇拜。他在是年二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

练”，所以对社会的影晌虽很大，而自身的成就却并不大。不过胡氏仍说：

近几口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

胡适纯从学术层面来看，对梁启超的“盖棺论定”，也许有他所持的理由，然而梁氏以一人抵万军，鼓励风潮，造成时势，希望使中国人知耻知病，希望登中国人于文明水平之上，其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实在叫人敬佩。就其影响而论，也足可不朽！

近人王晓波在给龙应台的一封信里说：“关于你对鲁迅和梁启超的‘感觉’，我非常同意。……梁启超是‘有教养的人’，有感情而无激情，是林献堂崇拜的偶像。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言，梁博学多识、贯通古今中外，借用日译介绍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其开创新文化之功不下于严复。胡适只会吹牛作秀，等而下之耳。”龙应台把这封信附载在她《百年思索》这本书里。胡适是不是只会“吹牛作秀”，大概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对梁启超“启蒙”的肯定，似乎所见略同。

《新民丛报》当年曾和革命党的《民报》，就国家救亡图存的方法、路线问题，做了长时期的大辩论。一方主张从改良国民德性着手，并透过立宪来改革政治，以免陷国家于乱局；一方则主张快刀斩乱麻，用武力推翻满清政府，以毕其功于一役。最后是革命派胜利了。不过，不仅民国初年国家支离破碎，国事如麻，不能说梁启超所担心的为过虑；就是后来社会仍有固陋的一面，人民的品德依然有待提升。因此，梁启超仍然值得我们怀念，梁启超的学说我们

仍然应该重视。

余生也晚，梁启超先生逝世几年后才来到人间，无亲炙的机缘，也没有那样的资格。但年轻时读他的文章，常热血满腔，不觉奋起。他的子、媳思成先生和徽音女士也未尝谋面，都是读了他们的一些文章，心仪其人。倒是两年前与友人到北京谒梁启超先生墓时，得识梁家的第三代从诚教授。从诚先生家学渊源，温文儒雅，除在大学任教，更组“自然之友”的组织，从事环保运动。维护自然生态，固为世界潮流之趋向，在中国则尤为迫切需要。从诚先生多年来的努力，渐获国际重视，极负声誉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二〇〇〇年颁给了梁先生，这是对他公益志业的肯定；而梁先生一介未取，把奖金全部捐给了“自然之友”。

梁启超先生试图以政治和学术挽救中国的命运，思成先生夫妇以维护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以光大中国的文化，他的弟妹思永、思庄等也在不同的领域各有不同的建树，而从诚先生则从自然物种处保卫中国的生态环境。百年来这一家族成员，从各别的途径都对国家做了贡献，也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今天的中国，包括海峡两岸，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或环保上，都有待后来者努力促进和充实。从诚先生编此书，名曰《薪火四代》，实深具意义——它不仅是梁氏家族的“薪火相传”，更是中国社会的“薪火相传”。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日于台北市

编者心语

梁从诫

二〇〇〇年春，由我编辑的《林徽音文集》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我和妻子方晶因此于同年五月应邀访问了台湾，受到各界的热情接待，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见到台湾公众希望对林徽音时代的文化和文化人有更多的了解，天下文化的高希均先生和王力行女士建议：再由我编一本包括梁家三代四人，即梁启超、梁思成、林徽音和我自己共同的文集，以飨读者。对此，我却感到为难。为他们三位编集子，我的学识已经不够，若把自己也包括进去，就更自惭形秽，且有攀附之嫌，须知，“靠祖宗荫蔽”是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中最要不得的糟粕之一。

几位朋友反复解释，说这是为了通过一个家族的经历，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精神及其传承有一个真切的了解。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一九九〇年曾应邀到夏威夷参加“东西方中心”一次学术会议。一位著名华人学者当众声称，在他眼里，四十年来“内地知识分子的脊梁骨都断了”，使我颇为难堪。我当然深知近几十年来内地知识分子的坎坷历程和它所造成的“伤痕”，但毕竟还有更多的人在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和灵魂。我反驳道：“不，只要还有人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审美观，能够脚踏在中国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在每日平凡的生活中实践着那种理念并传递下去，

哪怕只剩一个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就没有断！”

事实证明，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只剩几人，而是千千万万，还有新成长的一代在传承薪火。我本人虽然谈不上什么成就，也曾有过困惑和迷茫，但至少在根本上，还没有辱没先人。出版拟议中的这样一个集子，或许多少可以为此提供一个例证。

于是我惶恐地同意了两位朋友的建议，甚至还在集子后面附上了留学美国的女儿梁帆的几封家信，以表明“脊梁骨”的传承是有希望的。也因此，我建议本书以“薪火”为名。

祖父梁启超虽只享年五十有六，但却参与了从清末到民初的一系列重大社会运动，留下了自己的重要影响。他的文字，正是这些社会、学术活动的历史纪录。说来惭愧，我读祖父的作品甚少。小时候见到文言文，又是长篇议论，逃之惟恐不及，成天浸在《西游记》、《罗宾汉》、《人猿泰山》之类的“男孩书”中；成年后，我的兴趣又在其他方面，对前辈缺少研究。所以，我对梁启超和他的著作的认识，远不如一些文史界的朋友和学者，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做他作品的编撰者。我在自己的文选部分收了一九八三年为纪念戊戌变法八十五周年和祖父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的两篇讲话，权充为我对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的介绍吧。但是他的作品实在多得惊人，按现代书籍排印，其总版面字数应在一千万以上！包括时论、学术等诸多方面，其体裁包括专著、论文、时评、讲演、译作、诗文和家书等等。以他约四十年的写作生涯，每月平均竟要写两万字以上，这需要多么惊人的创作精力和毅力啊！作为后代，我除了自愧之外，没有什么话可说。

为适应当代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的需要，这里有意避开了他的大量时评、政论和学术专著，而主要选取了他对社会、做人、治学等方面的论述。这些远不足以反映祖父著述之全貌，自不待言。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至抗日战争爆发，正是这部分文字，曾激励起成千上万关注民族命运的中国热血青年奋而

行动,不论他们后来曾做过什么样的政治选择,投向了哪个营垒。

今天重读祖父的文章,仍痛感他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中国国民,特别是青年觉醒的殷切期望。这也正是他的文章至今仍对读者有吸引力的缘故。不知祖父如果地下有知,对此是喜还是悲?如果他近百年来的忧虑、呼喊和期待如今仍有其现实意义,不正好说明我们的进展还太小?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说,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种种艰难坎坷,原因都在于它始终未能冲出转型期的“历史三峡”。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的日子还须长久等待。然而,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究竟还能容我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三峡”里折腾多久呢?

一百年过去了,愿祖父的“笔尖常带感情”的文字能在新世纪之初再次燃起年轻人的热情,为早日实现他——也是我们大家——对这个民族的期望而奋起。

父亲梁思成,在祖父于戊戌变法失败后为避杀身之祸流亡国外期间生于日本。他是早期清华大学学生,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建筑,成为一位建筑学家,主要治中国建筑史。梁思成是国内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古代建筑的先驱者。三十年代,他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踏勘了全国两百余县,对当时尚存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做了一次全面的彻底调查,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实物依据。战争期间,他忍着国仇家恨,提出不轰炸日本文化名城——京都和奈良的建议,为美国远东战区空军司令部所接受。

梁思成也是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经创办了国内两所大学——(前)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桃李天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一九四九年后,他力争保护北京古城和城墙,但竟被“从天安门城楼上看下去,要处处都是烟囱”的主张所压倒。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遭到种种迫害。

他享年七十一,比祖父长寿,但一生艰辛坎坷——日寇的侵略战争、内战、在“革命”名义下遭受精神折磨,占去了他生命的大半,

使他在中年后便先后失去了自己的健康、妻子林徽音和治学的锐气。在巨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下,他晚年确曾感到深深的困惑和迷茫,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在建筑教育、古典建筑研究、文物保护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与追求。今天,已失去古都风貌的北京城,正是他悲剧性的努力下失败的物证。

和祖父不同,父亲著述集中于本专业领域,极少涉及其他。但父亲的许多作品,文笔活泼生动,并不拘泥于艰深的行业语言,而颇得“科普读物”之要旨;有一些,更是对非专业者的启蒙教材,很能引起隔行读者的兴趣,特别是与我母亲合著的作品,更富文学韵味。

二〇〇一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内地建筑、文物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出版了他的全集共九卷,总篇幅(包括图版、照片)近四百万字。

本文集所选的,主要是那些非专业读者也可能感兴趣的文章(或片段),当然只是他学术著作的极小部分。我所依据的蓝本,主要是由我的继母林洙为父亲编选的一个通俗选集——《凝动的音乐》。

母亲林徽音(又作徽因),是诗人,更是父亲的同行。她的文集早已在台湾流行,其中也有不少对她生平的介绍,包括我本人写的三篇。对于许多台湾朋友已经熟悉的“徽徽”,这里就不再做介绍了。只希望朋友们早日摆脱某些影视作品所留下的扭曲印象,许徽徽一个真实的原貌!因台湾已有过她的文集,出于篇幅考虑,此次对她的诗和书信做了一点删减,但其中没有任何评价意义,对此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需要说明:从三位先辈浩瀚的文字中恰当地选取有限篇幅,实在远超出了我的学养功夫。结果,我的选本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标准或原则,说是“跟着感觉走”也未尝不可,选收不当处必多,还要请内行读者多多包涵。

我本人于战前生于北平,当时祖父已经去世三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父母逃难到云南、四川。童年是在对日本战机轰炸的恐惧和对战后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在西南穷僻的乡村中度过的。我自幼顽皮好动,不爱读书。六十年后,我和老伴重返四川小镇李庄,一位当年的邻居,现已八十多岁的农民老太太指着我说:“我认得你,小时候不是老挂在树上吗?”

父母都曾指望我继承父业。在他们的熏染下,我也曾对古建筑发生过兴趣,可惜一九五〇年报考清华建筑系未第,入了历史系(后并入北京大学);但研究生毕业后在历史专业里工作仅有四年。文化大革命中,正值最好年华,却戴着半顶“反革命”帽子,“下放”到江西农村劳动,“修理地球”达八年之久。“文革”结束,回北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了若干年编辑,培养了一点对百科全书比较研究的兴趣和对官办机构的厌倦。一九八八年,从出版社辞职,扔掉了“铁饭碗”;一九九四年创立了民间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走上了一条坎坷的绿色之路。

回顾大半生,虽然大体未出文化圈子,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专业,也没有专著,只有几部译作。因此,不够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间或写一点东西,不过是一个无法摆脱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一点拉杂的心得笔记而已,不成体系,和祖父、父辈文集放在一起,实在有辱先人。

女儿梁帆,出生时林徽音已去世近二十年,梁思成也已故去三年,和我一样,无缘亲聆祖辈教诲。一九九二年国内高中毕业后便入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此后又在威斯康辛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目前在纽约市立大学读博士,仍攻哲学。

在她出国前,我最担心的是:年纪轻轻,会不会被异国文明“吞没”,而忘了祖国、忘了中华文化、忘了亿万仍然贫困的同胞?然而她回国度假,仍坚持穿着从箱底翻出的当年旧衣;遇华北干旱,为节水而拒用机器洗衣。但愿这点生活琐事和本文集发表的几封家

信能表明,我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最后需要说明:梁启超有子女、孙辈多人,其中一些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曾有其成就。如我的三叔考古学家梁思永,曾是三十年代安阳殷墟发掘的领导人之一,有过许多考古专著;三姑图书馆学家梁思庄,曾先后是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领导人;八叔航空专家梁思礼,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外甥杨念群(梁思庄外孙),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中年清史专家……这个特选的集子不是梁氏家族文库,集中未包括他们的作品,当然并不意谓梁启超其他后人在内地学术文化界没有他们各自的重要贡献。

二〇〇一年八月四日(六十九岁生日)